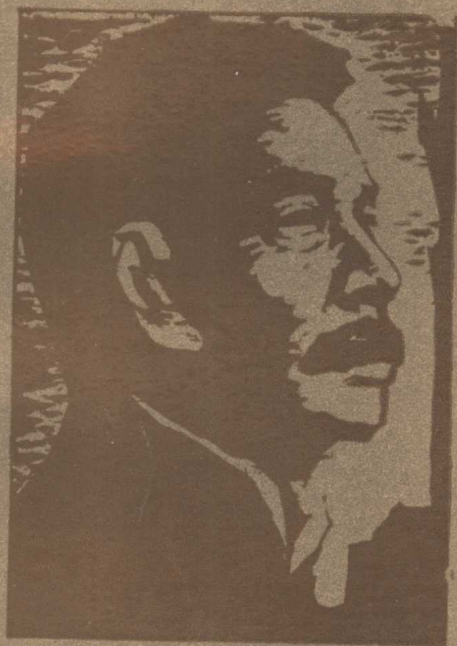


鲁迅论集

唐 弢 著



鲁 迅 论 集

唐 弢 著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鲁迅论集

唐弢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20.5 字数 469,000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800册

ISBN 7-5039-0710-X/I·348

定 价: 9.50元

序

偶然翻检旧时杂志，读到法国神父善秉仁(JOS. Schyns)的一篇文章，记述一九四八年他到上海访问叶圣陶、徐调孚、赵景深、臧克家、孔另境、罗洪等几位文艺界前辈和朋友，其中也提到我，说我正在继续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善秉仁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过《说部甄评》和《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两书，他的这段记述使我想起往事，唤醒我一些压在岁月底下的久已朦胧的记忆。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我就打算对鲁迅作些研究，劳人生涯，饥来驱我，一直未能认真着手。只记得当初有个想法：要研究鲁迅，不能不研究现代文学，正若要研究现代文学，也不能不研究鲁迅一样，这是两回事，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凡是涉及现代文学的材料，我便随手购置一些，积储一些。善秉仁的《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出版已经较晚了，这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苏雪林的《今天中国的小说和戏剧》，第二部分是已故赵燕声的《作家小传》，然后才是一千五百种小说和戏剧的介绍。《今天中国的小说和戏剧》虽然没有她后出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那样怀有政治偏见，但材料有不少谬误；《作家小传》篇幅略长，纠正了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的一些舛错，虽然离完美的境地还很远，却确是一点一滴，由个人摸索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最初的成绩，我见到一种抽印本，却似乎没有单独出版过。

善秉仁到上海和大家见面，是由赵景深代为邀约的，这以前我并不认识他。但赵燕声为了编作家小传，早已和我通信了；一九四四年因鲁迅藏书出售事我到当时的北平，我们还见了面，《帝城十日》十月二十日记的“晨，赵××来，谈有顷。”赵××就是他。我托他找过关于鲁迅的材料。后来介绍我和现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哈雷特·密尔斯（**Harriet Mills**）相见的也是他。密尔斯现在已是美国屈指可数的研究鲁迅的专家了，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正在编《鲁迅全集补遗》的续编，想找全份《莽原》周刊，一时找不到，密尔斯慷慨地将自己收藏的一份借给我，让我带回上海，但当用毕寄还，她却离开了北京。原件退了回来。一九八一年春密尔斯重来中国，物归原主，我将保管了三十年的这份杂志送还她，我们共同回忆了初次见面的经过。密尔斯还让我看了自己搜集到的版画，她正在研究鲁迅和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准备写成专著。

上面这些零星的事实提醒我：我留心搜集有关鲁迅的资料，几乎和留心现代文学不相前后，三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不过，要说较为认真和专注地从事这个工作，却是在一九四二年辑录《鲁迅全集补遗》的时候。在这之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被称为“孤岛”的上海随着沦没。到处是抄家逮人的消息。许多人毁书、烧书，大批大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不禁暗自心伤，有几天我都闷着，一言不发，最后下了决心：自己动手。别人卖书，我偏买书。那时我住在徐家汇，离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一间平房，门面狭小，另外两处堆栈的规模却很大，这一片地段的旧书废纸全归它收购。主人约摸五十几岁，姓唐，浦东人。他收废纸发了财。生活朴素，不改本色。老头儿认为这间小屋是他发迹的地方，仍旧把

它当作大本营，全家住在里面，门口放几堆书刊，当作收购站的标志。

我和老头儿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每次收到大批书刊，先让我挑选。我便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把可以省下来的钱都买书。有几次，一个人钻在堆栈里，早晚啃两个烧饼充饥，抢时间将急待出栈的废纸挑选完毕。这是一种并不轻松的劳动。我得将大捆废旧书刊解开，细细选拣，然后照老样捆扎复原。我没有给堆栈增加一点麻烦，因此栈里的工人和老头儿对我都很好，愿意和我合作。我在这里买到成卷的《新青年》、《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也有一些鲁迅译著的早期版本，如由孙福熙画封面的荷兰望·蔼覃的《小约翰》，新潮社文艺丛书俄国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等。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面对潮水般汹涌的纸堆，最后只好望洋兴叹，废然而止，自己约束住自己的感情。我和老头儿商量，将买下的书另外捆扎，当作未出栈的废纸，仍旧存放在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便将寄存的书刊带回家来，设法将它们一一安顿。

从此以后，我才着手对《鲁迅全集》的辑佚。

夜深了。徐家仁一带原是比较冷落的，这时街头戒严，十点过后，万籁俱寂，偶尔传来警车的凄厉的叫声。我已习以为常。一个人从瓦缝屋角，悄悄地捧出一批书刊，在覆着防空罩的幽暗的灯光下，展卷舒纸，开始了和鲁迅先生的对话。看来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有沉思，有怒骂；我从文章里领会他的思想，他的气质，他的性格和习惯；他有自己爱说的语言，爱用的词藻，完全娴熟了的说调，抑扬疾徐，宛若有节。他有所为，有所不为，慢慢地，我懂得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的道理，反过

来,我也多少知道一点什么样的事情他一定不做、什么样的话他一定不说的关键。我对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作了分析。复杂的辑佚工作锻炼了我。然而学无止境,我当时又实在太浅薄、太冒失了,仍不免时时有粗心大意、失于检点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因为次年十月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我把《鲁迅全集补遗》赶了出来,作为对伟大的先行者的追祭。以后又陆续发现一些遗文佚稿,解放后国家准备重印《鲁迅全集》,便将这些交给了主持其事的冯雪峰同志。雪峰劝我续编《补遗》,他说这样可以鼓励大家都来做辑佚工作,更有利于全集的刊行。在许广平、周作人、郑振铎诸先生支持下,我继续搜寻,一九五二年三月,终于出版了字数三倍于《鲁迅全集补遗》的《续编》。后来,报刊上仍有佚文发表,黄继持先生还在香港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三编》及其增订本,看来雪峰的想法没有落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的,这些都已由孙用同志甄别,辑入新版的全集。

我在这里絮絮不休地讲述往事,并非要为此集子里的文章作说明,提供历史环境或者写作背景,而是因为,由于这个工作,多少年来我有一点体会,说要夸大一点,我已形成一种观点,以为无论从事哪项研究,都要先做一点资料工作,亲自动手,整理辑录,这样大大地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使文章不致流于一般化。我之所以没有写出具有独创见解的研究鲁迅的论文,细想起来,虽然亲自做过一点资料工作,只是浅尝即止,未能痛下功夫,深入探索,使自己的思想和鲁迅的思想结成一片,所谓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这正是我,也许还可以认为是,我们大家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毛病。

我说要使自己的思想和鲁迅的思想结成一片,并不是说要

研究鲁迅，便得有像鲁迅那样的思想修养，这个要求不仅太高，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我是说要研究他，就应当了解他反映在作品里的生活，抱着和他共同的情怀和感受，即使你不同意他，有相反的意见，也需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一个设身处地的熟悉对象的过程，这样才能作出赞成或者反对的判断，否则的话，浮光掠影，人云亦云，那就不会有什么新意或创见了。

要熟悉反映在作品里的生活，自然也应当熟悉鲁迅生活着的——从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将近六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至少至少，也应当熟悉他正在写作——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三六年的整整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日本有一位翻译我的《鲁迅先生的故事》的儿童教育家三岛孚滋雄，有一次听我介绍鲁迅生平，他争执说：绍兴是周树人先生的故乡，仙台才是鲁迅先生的故乡。他的意思是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是在仙台中止学医、开始从事文艺运动的时候诞生的。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逝世之前，想到了出版《三十年集》，这样看来，三岛先生的意见，或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

其实不要说三十年，便是从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到最后写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止，前后十八年中，以中国社会的复杂、有关历史动态、时代风貌，以及文学创作通过艺术手段曲折地反映出来的精神生活的特征，要用明确、凝练⁽¹⁾、深刻的语言概括地加以说明⁽²⁾，也是颇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连这一点也说明不了，那又怎么能够深入地去剖析文学家鲁迅的独特作用和历史地位呢？鲁迅在谈小说创作的时候，对“五四”和三十年代这两个历史阶段的精神生活从文学上作了这样的概括：

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①

由文学革命的要求人性解放到革命文学的强调阶级意识，线索分明，但又没有一点简单化。鲁迅是同情一切被迫害者的，态度坚定，不过字里行间，对“五四”时期那些“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的见解，不无批评；而对三十年代阶级意识觉醒起来，终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的青年，实在也只有感慨无穷的叹息。历史是沉重的。我们见到了伟大的鲁迅！

除少数篇什外，我写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收入这本《鲁迅论集》了。这样做，是为了读者便于翻检。说是《论集》，其实是有论文，有考证，有随感，也有生活的片段的回忆。从千字左右的《关于〈故事新编〉》到长至七万字的《旗手鲁迅》，方式不一，我的目的无非是想从各个角度分析鲁迅，说明鲁迅，阐述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人贵自知，我极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问题，却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鲁迅曾引《庄子·秋水篇》里邯郸学步的故事，讲述他自己创作上“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②的苦境。其实研究工作也何尝不是这样。那个故事说：赵国都城邯郸人善于行走，他们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燕国少年纷纷前来学步，不料没有学好，却又忘记了自

① 《〈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② 《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

己原先走路的步法，没有法，他们只好爬回去了。鲁迅讲完这个故事，最后说：“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①

鲁迅这话是带有一点自谦的意思的，但对在研究工作上的确还在爬着的我，却是一个很大的策励。

唐 弢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

^① 《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

目 录

序	1
旗手鲁迅	1
——关于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从《且介亭杂文》论鲁迅	103
鲁迅的杂文	110
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	114
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道路	126
鲁迅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	142
走鲁迅思想锻炼的道路	155
正确理解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意见	166
在文艺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76
——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三次论争	
“小事”不“小”	202
——谈《一件小事》	
鲁迅不喜欢戏剧艺术吗？	214
政治任务与艺术特征	229
——谈鲁迅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238
——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鲁迅的反映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的诗篇	262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	282
——谈《故事新编》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292
“于无声处听惊雷”	326
——读鲁迅一九三四年《无题》诗	
《白光》和《长明灯》	330
——为英文版《中国文学》作	
《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	336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346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鲁迅杂文一解	391
关于《故事新编》	402
——为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季刊》作	
关于《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对	404
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	407
《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	410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编校后记	426
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433
友谊的选择	436
——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对《玻璃神》小说的商榷	444
——读了村田俊裕和中野美代子文章之后	
读后书怀	451
——读《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	
写完以后的话	460
——《鲁迅的故事》跋	

花团剑簇	464
——读新发现鲁迅佚文十一篇	
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并非鲁迅佚文	467
英译本《两地书》序	473
《鲁迅日文作品集》序	478
“拙的美”	486
——漫谈毛边书之类	
《鲁迅日文作品集》再版题记	491
 鲁迅先生丧仪散记	495
记鲁迅先生	501
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510
鲁迅和鲁迅纪念馆	516
——为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作	
琐忆	529
附录 关于《琐忆》	535
断片	539
一点往事	548
——纪念鲁迅诞辰九十五周年	
回顾	556
——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编辑”三事	569
《帝城十日》解	579
——对许广平《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的一点补充	
鲁迅和周木斋	586
——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	
备考 也谈鲁迅和周木斋（广隶）	593

少年队友的鲁迅先生	596
从杂文学习遗教	601
鲁迅纪念馆记事	604
看法改变了	609
门外汉手记	612
——《鲁迅文献记录片》编写随想	
鲁迅佚文的发现	618
一份书目	623
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 —— 鲁迅	627
——汪晖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代序	

旗手鲁迅

——关于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仗着“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小说和野史笔记，这样广泛的阅读不仅培育了他研究文艺和历史的兴趣，同样也启发了他对历史的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

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①，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②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他对“物竞天择”规律的理解，不禁深深地为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感到忧虑。他不满洋务派那种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鲁迅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矿路学堂毕业，鲁迅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〇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风起云涌。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① 《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

② 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论与伦理学》。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